

“四人邦”与假洋鬼子

——重读鲁迅《阿Q正传》

龚 依 群

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教导我们：“《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遍，没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看。”毛主席着重介绍了《阿Q正传》中“不准革命”一章，指出，有些人不准别人革命，“很有点象假洋鬼子”。今天看来，“四人邦”正是不准革命的“假洋鬼子”。毛主席提出的问题，正是揭批“四人邦”的一个要害问题。我们今天重新学习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对于深入揭批“四人邦”的斗争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什么说“《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列宁在《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一文中教导我们：“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那末他就一定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正是根据这样一个标准，列宁才肯定艺术家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一九〇五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面镜子。那末，鲁迅的《阿Q正传》是否也反映出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某些本质方面呢？答案是肯定的。《阿Q正传》发表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正当“五四运动”后两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刚半年，

中国革命完成了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鲁迅也开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宣称这个时期的作品是遵奉“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而写作的。《阿Q正传》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描写的是“辛亥革命”这个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伟大历史事件在农村的反映，这个描写是成功的。辛亥革命是一次流产了的革命，《阿Q正传》基本上把这个流产的过程生动地反映出来了。它是辛亥革命失败经验的形象的总结。其广阔的深远的社会认识意义很值得我们重视。毛主席之所以号召我们“好好地看看”，“再看一遍”，就是希望我们从中吸取一些历史教训。

“鲁迅在这篇小说里面，主要是写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这个农民就是小说的主人公阿Q。小说所描写的未庄，是江南农村的一角，也是全中国农村的缩影。当时农村的阶级矛盾是很尖锐的，未庄的阶级斗争阵营，一方是以赵太爷和赵秀才、钱太爷和假洋鬼子为代表的地主豪绅（上边有他们的政治代表——清朝的县官老爷、老把总和大劣绅举人老爷）；另一方是以阿Q为代表的贫苦农民。鲁迅抓住了这一基本矛盾，并把它贯穿到小说情节发展的始终，写出了未庄阶级斗争的生动画面。毛主席在谈到农村这一矛盾时写道：“农民被束缚于封建制度之下，没有人身自由。地主对农民有随意打骂甚至处死之权，农民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未庄

不正是这样的农村的典型吗？由于赵太爷们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贫苦农民阿 Q 不但没有土地，没有住房，没有固定的雇主，甚至还不许有自己的姓氏。这已经是够悲惨的了，但是更悲惨的遭遇还在后头：阿 Q 竟由于一个偶然的“恋爱的悲剧”而得罪了赵家，以至完全失去了做雇工的权利，不能不出去搞点“外快”以解决“生计问题”；而当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辛亥革命发生以后，阿 Q 又被剥夺了革命的权利，最后连生命也毁灭了，这不是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的写照吗？阿 Q 这个形象是比较复杂的，他是农民，有游民习气，但不是流氓，鲁迅在《寄〈戏〉周刊编者信》里说：“我的意见，以为阿 Q 该是三十岁左右，样子平平常常，有农民式的质朴……，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不过没有流氓样，也不象瘟三样。”这就是鲁迅给阿 Q 的鲜明画像。阿 Q 的性格特征就是经常用“精神胜利法”来“克服”怨敌，例如打架打输了就说是“儿子打老子”之类，这种“精神胜利法”被说成了“阿 Q 主义”或“阿 Q 精神”。鲁迅刻画这个典型性格的用意，他自己说是要“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俄文译本〈阿 Q 正传〉序》），目的“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再谈保留》）以便加以疗救和改造。这就是说，“阿 Q 主义”或“阿 Q 精神”有着广阔的社会意义，不仅是“农民意识”问题。《共产党宣言》指出：“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阿 Q 主义就是封建阶级几千年来思想统治和思想腐蚀所形成的封建意识形态在农民身上的表现，是封建统治阶级

加在农民身上的精神枷锁，而封建统治阶级本身就存在着这种阿 Q 主义，而且非常浓厚，从封建王朝到蒋介石无不如此，例如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和《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等文中，就指责国民党有阿 Q 主义；这就是说，阿 Q 主义这类毒瘤，虽然有时候长在人民身上，但根子却在反动统治阶级那里。这也就是阿 Q 的长期落后而不觉悟的病根。

“他专门写了‘不准革命’一章，说假洋鬼子不许阿 Q 革命。”阿 Q 既然落后而不觉悟，那末，他要不要革命？会不会做革命党？一九二六年郑振铎曾在《“呐喊”》一文中认为，阿 Q 做了革命党是“料不到的”，“至少在人格上是两个”；鲁迅不同意这种看法，他曾说过：“中国倘不革命，阿 Q 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 Q 的命运，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阿 Q 正传〉的成因》）是的，阿 Q 既贫穷而又失业当然会有革命要求，即使这种革命要求是朦胧的，自发的，幼稚的，究竟仍然是要革命。鲁迅写了阿 Q 要革命，但并没有美化阿 Q，他写阿 Q 在革命发生前后性格的发展完全是合乎逻辑的。阿 Q 在革命前反对过革命，“他有一种不知从哪里来的意见，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这里我们又看出了反动统治阶级的精神枷锁的作用；但是革命开始后，“殊不料这却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有这样怕”，使他“神往”，“况且未庄的一群鸟男女的慌张的神情，也使阿 Q 更快意”，于是阿 Q 的思想发展了：

“革命也好吧”，“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终于，决定“投降革命党”了，而且终于大嚷：“造反了！造反了！”但是，这种革命要求是糊涂的，混乱的，不过是要点东西，杀死几个“未庄的狗男女”，讨个老婆等等，而且弄不清敌友我，把同是农民的王胡、小D等也当作“杀”的对象了，以后也始终没有能够提到较高的水平。这里我们必须看到当时的历史条件：那次资产阶级旧民主革命是由民族资产阶级（以孙中山的同盟会为代表）领导的，这个阶级是不能把民主革命领导到最后胜利的，其原因毛主席后来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了：“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规定了他们的软弱性，他们缺乏远见，缺乏足够的勇气，并且有不少人害怕民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然而，他们不抓农村工作，不发动农民群众，这样，就使广大农民群众长期处于“落后、不觉悟”的状态。失去这个主力部队，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只好靠上层勾结来结束革命的进程，把政权拱手让给大军阀（北洋军阀的总头子）袁世凯而换取了一个“中华民国”的假招牌。因此，毛主席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个失败反映在《阿Q正传》里，就是：清朝的知县大老爷和老把总都是原官，不过改了个名目，举人老爷也做了官了，连未庄的赵秀才、假洋鬼子也进了什么“柿油党”（自由党），各得一块“银桃子”（证章），所有旧中国的牛鬼蛇神，可算是一律都“咸与维新”了。这伙

“假革命的反革命”当了权，还有阿 Q 们革命的余地吗？还有阿 Q 们的活路吗？肯定是不会有。这就是假洋鬼子不准阿 Q 革命的背景，曾经大嚷“革命了！革命了！”的阿 Q，终于冤里冤枉地得了人头落地的“大团圆”结局。

“不准革命”，并不是假洋鬼子所独有的，这种例子，历史上有，现在也还有。毛主席指出：“我看在这点上，有些人很有点象假洋鬼子。”的确，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搞反动路线的头子都是不准别人革命的，他们大搞“惩办主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现在的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也继承了他们的衣钵，而且远远超过他们的先辈。他们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政治需要出发，主张打倒一切，以便取而代之。他们全面篡改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篡改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他们抛出了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妄图把中央和地方一大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统统打倒。为了制造这种反革命舆论，他们在文艺领域大肆提倡“写和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专搞阴谋文艺，而且要矛头向上，越大越好，于是《反击》、《盛大的节日》这类毒气薰天的作品出笼了。他们躲在自己的狗窝里“欣赏”各地的死党和爪牙送上来的“小报告”，找出要整的对象来，然后从他们的“帽子工厂”、“钢铁工厂”里拿出各种各样的帽子和棍子来，把他们认为对他们篡党夺权不利以及敢于顶撞他们的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打下去。总之，他们是“打倒一切”、“不准革命”，以便达到“你下

台，我上台”，“只许我反革命、不许你革命”的反革命目的。

“对于革命来说，总是多一点人好。”这是毛主席一贯的主张。毛主席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特别强调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因为我们的干部和群众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在《论十大关系》中，毛主席提出了伟大号召：“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万恶的“四人帮”却硬要和毛主席这一系列英明指示唱反调，疯狂反对和打击党内外的绝大多数，他们所要的只是“四人邦”自己以及他们的死党和爪牙那一小撮。因此，他们的下场是，积怨甚多，人心丧尽，完全孤立，自取灭亡！当年未庄的假洋鬼子在往后几十年人民革命的熊熊烈火中灰飞烟灭了，现代的假洋鬼子“四人邦”同样得到了可耻的下场！《阿Q正传》不仅是辛亥革命的一面镜子，这面镜子也在今天照出了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丑恶咀脸！

遵循毛主席的指示，结合当前运动重读《阿Q正传》，更感到毛泽东思想的英明正确，和鲁迅著作思想性的深刻。让我们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英明领导下，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发扬鲁迅“痛打落水狗”的革命精神，把深揭深批“四人邦”的斗争进行到底！

学 习 鲁 迅

永远和工农大众同呼吸共命运

龚 智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深刻指出，看一个人“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这一个辨别的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青年运动的方向》）。鲁迅是怎样认识这个问题，又是怎样处理他和群众的关系的呢？——一九三四年八月，鲁迅在《门外文谈》中说：“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且介亭杂文》）这句十分朴素而又富含哲理的话，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明了个人与群众、做大众人和做大众事业的正确关系。我们党历来有一个优良的作风，这就是始终不渝地贯彻群众路线，依靠工人阶级，依靠贫下中农，依靠知识分子团结其他劳动群众，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不为个人或少数人谋取私利。但是近几年来，党的这一优良作风被“四人帮”破坏得非常严重，对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危害很深。现在，“四人帮”虽然被打倒了，但是其流毒并没有完全肃清。我们重温鲁迅关于群众关系的论述，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四人帮”的反动本质，促进我们更好地同工农群众相结合，恢复

和发扬被“四人邦”破坏了的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正确认识大众 正确认识自己

要想成为“大众中的一个人”，首先必须正确认识大众，正确认识自己。

一切反动派，一切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一切唯心主义者，都是把自己打扮成“天才”、“救世主”，而把群众看成“愚昧无知”的“群氓”。刘少奇把群众看作“工具”，林彪污蔑群众只知道柴米油盐酱醋茶和妻子儿女，“四人邦”骂工人“屁也不懂”，诬蔑贫下中农“听修正主义的”，给知识分子扣上“臭老九”的帽子。他们诽谤群众，压迫群众，打击群众，都竭力要在自己的头上涂抹一个“先知”的光圈，不愿意、也不可能成为“大众中的一个人”，他们只能是大众的对立面。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则以满腔热情赞扬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和作用。当帝国主义及其奴才们污蔑和攻击人民大众的时候，他立即予以有力的反击。一九三四年，有人攻击说“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鲁迅愤怒地驳斥道，“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要看中国人的自信力，从状元宰相的文章是看不到的。必须看“地底下”的群众（《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国

的脊梁”，这是对人民群众支撑世界，推动社会前进的极为生动，极为形象的说法，这里包含了鲁迅对人民群众无限崇敬的思想感情。鲁迅首先说明，英雄人物，首先觉悟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历史中的作用是不能抹煞的。就拿后者来说吧，“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但是，应该认识到，“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坟》·《未有天才之前》）。没有民众就没有天才或英雄，这个关系是绝对不能弄颠倒的。其次，个人只有在成为“大众中的一个人”的时候，他才可以成为大众的代言人，“做大众的事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否则，就会被人民群众所唾弃，被奔腾前进的历史潮流所吞噬。最后，任何个人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都将一事无成。鲁迅举了一个很生动的例子：资产阶级的一代“英雄”拿破仑，在经过阿尔卑斯山的时候，说他比山还高，气魄是相当大的，但是如果他后面没有千千万万的士兵可以作为依靠，那我们只能认定他是一个“疯子”。鲁迅还进一步说明，个人与群众相比，个人往往幼稚可笑；自以为聪明的高贵者与被视为“愚民”的相比，聪明人并不聪明，愚人并不愚蠢。

今天的事实再一次证明了鲁迅的论断是无比正确的。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一不会做工，二不会种田，三不会打仗，手中没有真理，身边没有群众，却千方百计想骑在群众头上作威作福，因而人心丧尽，极为孤立。对“四人帮”的反革命罪

行，广大工农兵群众早就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粉碎了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这个英明的措施，代表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心愿，大得人心，大快人心。

鲁迅还说明，要做“大众中的一个人”，必须首先深入大众，了解大众，甘心做群众的小学生，才能正确地教育和引导群众，才能做好大众的事业。鲁迅明确提出“到大众中去学习”的口号。他在批判资本家的乏走狗梁实秋的时候说：

“梁实秋先生们虽然很讨厌多数，但多数的力量是伟大，要紧的，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都和他们无干，仅止于几个人在书房中互相叹赏，得些自己满足。”（《二心集》·《习惯与改革》）

鲁迅总是把自己放在群众之中，视自己为“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有人曾请他写自传，又有人要给他作传，鲁迅对此很不热心，并且加以反对。他认为如果象自己这样的人也可以作传，“那么，中国一下子可以有四万万部传记”（《致李霁野》）。农夫耕田，泥匠打墙，“历史上有没有《乡下人列传》或《泥水匠列传》，他向来就并没有想到”（《且介亭杂文二集》·《徐懋庸作〈打杂集〉序》），自己为什么就应该写自传或热心于别人给自己作传呢？这和“四人帮”反党集团是一个极其鲜明的对照。江青为了请人给她作传，不惜奴颜婢膝，向外国人出卖国家机密。她哪里想到要做“大众中的一个人”呢？她梦寐以求的，是要做骑在大

众头上的当今“女皇”。“四人邦”就是这样一群无耻之徒，较之鲁迅，何止天上地下。我们还看到鲁迅经常以人民大众为镜子，严格地解剖自己，向人民大众学习。一九三二年他在《二心集·序言》里，曾对自己作了这样严格的解剖：“我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地在‘碰壁’，怎样地在做蜗牛，好象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也正是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他认为不能说“我是无产者”，他实际上是把自己看作远不如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大众的。毛主席曾在的一封信中教育江青学习鲁迅严于解剖自己的精神，指出人贵有自知之明。但是她根本听不进去。王张江姚“四人邦”本来是一伙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却百般打扮自己，演戏似地指着自己的鼻子说他们是什么“无产阶级左派”，“正确路线的代表”，但是伪装是不能持久的，事实撕破了他们的假面，证明他们是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的凶恶敌人。

做大众中的一个人 做大众的事业

我们向鲁迅学习，就是要象鲁迅那样，做大众中的一个人，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全心全意地为人民大众谋利益。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利益、愿望和要求的集中体现。做大众的事业，为人民服务，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共产主义者的鲁迅，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

边，勇敢地向外部的和内部的敌人作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是一方面反革命的‘围剿’，又一方面革命深入的时期。”（《新民主主义论》）毛主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制定了一条马克思主义路线，即“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红军和根据地人民接连粉碎了蒋介石三次反革命“围剿”。当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的消息传来的时候，鲁迅激动异常，写下了《湘灵歌》这首诗，热情歌颂红色革命根据地的伟大业绩。一九三二年，陈赓同志从根据地秘密转到上海治伤。鲁迅闻讯后，立即请陈赓同志到家作客。他请求陈赓同志详细介绍红军和根据地人民的斗争情况，并准备写一部长篇小说热情赞颂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后来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没有写出，但他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党的感情却越来越深厚了。一九三五年十月，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红军胜利地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了陕北。鲁迅满怀崇敬的心情拍发了一封祝贺电：“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他对青年朋友说，他是毛主席的“一个小兵”，“我想，做一个小兵还是能胜任的，用笔！”

红军长征的胜利，一方面粉碎了蒋介石的军事“围剿”。另一方面也以自己北上抗日的行动促进了全国的抗日斗争。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毛主席提出了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路线，并且特别强调“共产党和红军在民族统一战线

中的领导作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遭到了托派的污蔑和反对。在这一场严重的斗争中，鲁迅又一次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这一边。他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自豪地说：“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且介亭杂文末编》）他又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坚决地说：“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同上）。鲁迅不愧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始终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在革命队伍中，有些人之所以不能摆正个人和群众，个人和革命的关系，不能与大众同呼吸共命运，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头脑里还是一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独立王国。三十年代的有些所谓“革命文学家”就是这样。他们或者为小集团，或者为自己而参加革命，是想借革命来谋私利的，所以和大众格格不入。这种人从来就不和大众一心，一旦自己的私利得到一些满足，一旦革命受了挫折，他们就会从与大众若即若离到完全分离，甚至站到大众的对立面上去。针对这种现象，鲁迅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演中，提出为工农大众的口号。他说：“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二心

集》) 鲁迅的目的是完全为工农大众的。为此, 他不辞劳苦, 不知疲倦, 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 从不讲什么功劳和苦劳。他的人生哲学就是: “让别人过得舒服些, 自己没有幸福不要紧, 看见别人得到幸福, 生活也是舒服的!” (许广平《鲁迅回忆录》) “凡是为中国大众工作的, 倘我力所及, 我总希望(并非为了个人)能够略有帮助。”(《鲁迅书简》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书信) 这是多么崇高的无私品质。

早年, 鲁迅为《新青年》等许多刊物写稿, 都是没有任何报酬的。定居上海后, 鲁迅仅凭微薄的稿费生活, 比较艰苦, 但他不仅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贡献给工农的解放事业, 而且以有限的收入接济党和革命团体的费用。如鲁迅参加了原由恽代英同志发起组织的“互济会”, 积极救济被难者家属。鲁迅日记中有许多这方面的记载: 一九三〇年六月七日“捐互济会泉百”, 一九三一年八月十五日“夜交柔石遗孤教育费百”等等, 鲁迅甘心情愿地做大家的公仆。他有时简直一面吃药, 一面做事, 但他不仅“毫无不平”, “不但不以生命来放阎王债, 想收得重大的利息。而且毫不希望一点报偿。”(《集外集拾遗》·《新的世故》)

鲁迅的晚年, 因为严重的肺病而健康恶化。一九三六年春, 当一位美国肺科专家来给鲁迅作诊断时, 他的肺部已经烂掉了五分之四, 体重仅三十七公斤。这位医生检查后, 非常钦佩鲁迅的顽强意志, 说患有这样重病的人, 如果在美国和欧洲, 恐怕五年前就死去了, 但鲁迅却继续繁忙地工作,

勇猛地战斗。外国友人早就劝他到国外去休养，鲁迅决定永不离开中国的战斗，他谢绝了。当他病重得连二十几年来从未中断的日记也只得停记的时候，宋庆龄以“你的生命，并不是你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感人肺腑的言词，劝他速进医院治疗。但是，他仍然谢绝了，因为他要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作出最大的贡献。他曾经说过：“我把我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许广平《关于鲁迅的生活》）“不看书，不做事，我一天都活不下去，我一生没养成那样的习惯。”他认为与其不工作而多活几年，倒不如赶快工作而少活几年为好。他催促自己“要赶快做。”

鲁迅是不相信住洋楼，喝咖啡，却自称是“真的无产者”的“革命文学家”的。鲁迅作为一个共产主义的战士，坚决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永葆了革命的青春。鲁迅有句名言：“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转引自《鲁迅先生二三事》）鲁迅经常拿自己的生活与劳苦大众相比较，严厉地批判自己，认为自己的生活已经够安逸了，

“劳苦的是中国的老百姓，你看他们一声不响，默默地把自己汗血贡献了出来……”在十里洋场的上海，鲁迅拒腐蚀，永不沾，他身上穿的都是布衣，有时甚至缀有一大块的补丁。他到印刷所接洽印件，或到制板公司去制锌板，人家把他当作是商店里的跑子或伙计。到外国人的公寓里去访友，人家把他当作是仆役，不准他乘电梯，要他一步一步地走上九层楼。这些，鲁迅并不以为耻辱，而是当作嘲笑金钱世界

的资料。一九三一年，鲁迅在旅馆里避难，有一位姓杨的工友，天天和鲁迅围炉谈天，有时还叫他代写家信，根本想不到这是闻名国际和国内的鲁迅，实际上“这就是十足的鲁迅。”（许广平《关于鲁迅的生活》）对照伟大的鲁迅，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出，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他们表面上高喊什么“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实际上奢侈糜烂，大肆挥霍人民的财富，比资本家还厉害，是地地道道的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我们必须彻底揭露和批判“四人帮”反党集团的罪行。

努力改造世界观 永远同大众一道前进

鲁迅并不象陈伯达一类政治骗子所说的是所谓“先知”，生来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认识到做“大众中的一个人，……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是有一个过程的。

鲁迅世界观的转变，是以一九二七年为分界的。前期的鲁迅是个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所以，前期的鲁迅尽管也深刻地批判了辛亥革命脱离群众的根本错误，抨击了反动的封建阶级，也否定了资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并且提出了农民这个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如《阿Q正传》），但是他还没有找到新的生产力的代表——无产阶级，解答不了他自己所提出的中国的出路问题。促使鲁迅世界观转变的主要因素有三个。

一、亲身参加革命实践，接受阶级斗争所提供的经验教训。鲁迅原是把希望笼统地寄托在青年身上的，他虽然也知